中央财经大学 校报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3 年 7 月 13 日　第 16 期
第 544 期（总第 737 期）
投稿邮箱：xbbjb@cufe.edu.cn
电子校报：http://cufepaper.cuepa.cn

教育部主管　中央财经大学党委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832/(G)

2023 全球财经论坛
Global Forum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lobal Economic Growth

首届“全球财经论坛”在京召开

本报讯 7 月 8 日，由中央财经大学、经济日报社联合主办的首届“全球财经论坛”在京召开。

“全球财经论坛”依托中央财经大学在财经领域的雄厚学术基础和特色社会资源，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为主题，立足中国，放眼全球，聚焦全球财经领域热点，围绕国际化、高端化、专业化特色，邀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国际组织负责人、国际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发表主旨演讲，为全球政产学研各界提供一个深入、专业的财经学术交流平台，积极推动国际学术交流。

中央财经大学党委书记何秀超，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郑庆东发表开幕致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罗伯特·恩格尔（Robert F. Engle）、罗伯特·奥曼（Robert J. Aumann）、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张向晨发表视频演讲。希伯来大学讲席教授什穆埃尔·扎米尔（Shmuel Zamir），希腊色萨利大学教授、前校长乔治·佩罗歇（George Petrako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与战略审查处副处长米歇尔·卢塔（Michele Ruta），中国财政学会会长、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高培勇，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马海涛，中信银行拟任行长刘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博雅特聘教授姚洋出席论坛并做主旨报告。兄弟高校负责人、相关学科带头人、企业家代表等 400 余人参加论坛。

何秀超在致辞中指出，经济全球化在大波动、大动荡中前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塑造了新动能、新机遇。在全球经济复苏和变革的关键时刻，我们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夯实对外开放经济基础，形成畅通的循环系统，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坚持高标准绿色发展，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积极参与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有力促进绿色金融市场的全球性发展。要坚持高质量数字赋能，以数字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

郑庆东在致辞中指出，中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并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我们必须加强团结，秉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理念，推动世界经济加速复苏，促进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首届“全球财经论坛”致力于为各国有识之士搭建学术互动平台，希望大家在这个平台上坦诚对话、畅所欲言，在思想碰撞中凝聚共识，在交流互鉴中促进合作。

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罗伯特·恩格尔、罗伯特·奥曼分别做题为 Digital Economy in the AI 2.0 Era，Climate Stress Testing and Financial Market，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entives 的主旨演讲。斯宾塞表示，人工智能时代 AI 技术将对整个经济领域特别是金融、经济、贸易和各类商务业务造成影响，如何用好大数据技术安全发展数字经济，需要我们共同探索和思考。奥曼阐述了激励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博弈论最重要的元素是利用激励机制来实现目标，而企业管理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向人们提供正确的激励机制。恩格尔提出了气候风险下的投资组合与风险预测，利用市场对气候风险和对金融影响的度量，实现市场对气候风险感知的最新评估，并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国家之间比较。张向晨指出，全球生产和贸易在经历了三年疫情的巨大扰乱后，正逐步回归正常。他从全球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挑战以及如何应对三个方面进行了分享。什穆埃尔·扎米尔（Shmuel Zamir）提出，在复杂金融、经济决策中应用博弈论，能够帮助决策者更好地制定主导决策，更快找到一种机制实现预期结果的平衡。乔治·佩罗歇（George Petrakos）从欧洲地理不平等发现收入分配地区的空间不平等现象持续存在，提醒研究者重新审视其政策组合、执行水平和资源分配。米歇尔·卢塔（Michele Ruta）阐述了不断变化贸易格局的主要特征、基金组织在贸易方面的工作、基金组织未来的贸易工作计划等，提出了在全球贸易增长放缓中如何制定货币政策与组织策略。

楼继伟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增长要采取适宜的政策，更需要机制性改革。要保持适宜的增长速度，由投资驱动转向以消费驱动为主，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着手解决影响财政可持续性的重大问题。江小涓指出，应多种政策并用，进一步发挥经济复苏更强劲新动能，统筹国内国际双循环，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开放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融入全球经济。高培勇指出，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想问题、提对策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立足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实情。现阶段推出的扩张性政策，要把握好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和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两个警戒线。马海涛从高质量发展对财政政策提出的新要求、赋予的新使命、催生的新路径三个方面阐释提升财政政策效能，由财政单向发力转为重视政策的协调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刘成从银行业角度，以中信银行探索打造金融服务新范式的具体实践为基础，提出商业银行要坚定信心，围绕高质量发展要求，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坚持内涵式发展，严控金融风险，推动金融服务“提质、扩面、增效”，加快以新服务、新体系、新技术、新生态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姚洋从数据分析切入，分享了关于经济贸易、产业转移和对“脱钩论”。他认为中美竞争给了中国一个参与全球规则制定的机会。我国要从具体事务着手，推进中美竞争的规则，要加大对光子芯片等未来技术的投资。

本届论坛云集海内外学术名家，聚焦全球热点，立足学术前沿，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以实际行动回答了“强国建设、教育何为”“教育强国、中财大何为”的时代命题，为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为进一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提高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贡献了中财大力量。

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中国财经报》等 30 多家主流媒体对论坛盛况和专家观点报道共计千余次。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朝闻天下栏目，财经频道经济信息联播，中文国际频道今日环球、中国新闻栏目，央广经济之声等先后 9 次从不同角度聚焦论坛盛况，报道国际国内专家观点。《经济日报》头版、要闻版、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微博、中国经济网先后多次报道论坛盛况，直击会议热点，理论版更是以两个整版对国际国内专家观点展开深入报道。《中国财经报》综合新闻版、金融版、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腾讯新闻号多次报道论坛盛况，思想广场版对专家观点进行整版报道。

下午，三个平行分论坛同步举行。

分论坛一的主题为“金融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由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承办，分两个阶段进行，分别围绕“金融创新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有效性”“中国特色估值体系与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两个话题展开讨论，14 位嘉宾就汇率与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数字经济与中国家庭消费、ESG 的资本监管框架构建、利率调控体系变革、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征信基础建设、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助力创投行业发展、中国特色估值体系构建、数字资产监管、融资平台债务机理、财税政策协调等相关议题发表演讲，与会者们共同探讨金融创新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问题，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为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为金融创新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助推高质量增长。

分论坛二的主题为“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安全与发展的前沿问题”，由中央财经大学创新发展学院承办，探讨了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安全与发展这一重要问题的诸多前沿主题，包括数字经济监管、可持续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技术进步背景下的老龄化问题，创新对持续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媒体和信息技术进步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深刻经济内涵等，为正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学术界的创新思路和方案。

分论坛三的主题为“人口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由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保险学院、中国精算研究院共同承办。与会嘉宾围绕“人口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命题，提出人口发展形势对国家发展和经济社会运行的影响长期而深远，深入分析了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提出了人口数量、结构方面的变化对人口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从统筹人口发展与安全、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方面提出了应对各种现实挑战与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为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创新性的思路举措。

主办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经济日报　战略支持单位：ICBC 中国工商银行　中信银行 CHINA CITIC BANK　支持单位：中邮保险 CHINA POST INSURANCE　协办单位：中央财经大学科技园

主编：雷洪峰　副主编：孙颖　本版编辑：李涓　美术编辑：张静逸　实习编辑：黄粟、程钰婷、王琬婷、张赫萌、卢柳全

2023 全球财经论坛 Global Forum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lobal Economic Growth

把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楼继伟

中国经济是逐步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而且同全球经济发展互相促进，任何力量都很难将中国同全球经济脱钩。现主要结合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谈几个方面的看法。

一、改革开放开启了经济高速发展阶段

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4年通过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配套改革，包括税制、分税制、市场准入、金融改革、人民币经常项下可兑换，并解除了价格行政管制，市场对资源配置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改革开放不断推进，2001年中国加入WTO，成为主动融入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我国高速度、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支持中国高速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红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大量人口到八十年代进入就业期，这时抚养比低，劳动力充裕。在生产函数中表现为劳动力要素收益低、资本要素收益高，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效应，提高了投资占GDP的比重，推进了经济增长。同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有巨大的竞争优势，也带动了经济增长。

还有一个特殊原因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各地相互竞争保持高增长的格局。这有利有弊，一段时期确实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但也出现有些地方超出财力可能，违规举债大搞基本建设的现象。

在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提高财政赤字，集中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当时基础设施处于十分薄弱的状况，扩张性财政政策给一些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更为重要的是，基础设施有效改善，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支持了经济增长。

二、进入新时代逐步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之前出现的过多关注增长速度、而不关注增长质量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钢铁、水泥、化工等与大规模基建投资相关的产品出现产能过剩。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有些地方又开始大规模举债搞基建，地方政府债务快速攀升，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大量金融资产进入地方隐性债务和房地产领域，金融脱实向虚并蕴含着系统性风险。生态环境恶化，水污染和空气污染严重，2013年北京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只有176天。人口老龄化趋势显现，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下降，劳动成本快速提高。与此同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2013年7月，党中央提出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时期，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接下来采取一系列举措，中国经济开始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在全国范围内治理空气污染。通过改变取暖方式，关停高污染企业，加强水污染处理等措施，生态环境逐步向好。2013年至2022年，重污染天数下降了92%，其中，2022年北京市空气优良天数提升到286天，重污染天数从58天降到了3天。

实施脱贫攻坚战略。通过基础设施下乡、发展特色产业、加大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发达地区对口帮扶等措施，现行标准下近9900万贫困农民摆脱了绝对脱贫。

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个方面重点工作。党中央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等针对性要求，引导经济持续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三、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把握几个关键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重大判断也是对前一阶段转型的规律性认识。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彻底改变过去主要靠要素投入、规模扩张、忽视质量效益的粗放式增长，以及由此产生的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杠杆增加、风险加大、效益低下、环境污染、公共服务不足等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采取适宜的政策，更需要体制机制性改革。

第一，要保持适宜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以往在9%左右，逐步转为6%至7%，今后五年潜在经济增长率应该在5%至6%。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再过五年可能会降到4%至5%。短期宏观调控政策十分重要，在不产生通货膨胀的前提下，尽量将经济增长维持在潜在增长率水平。

如果不出现特殊情况，今年经济增长速度会超过5%，考虑到去年的低基数，仍低于潜在增长率，不利于保持充分就业。再叠加不利的外部因素，总体评判有必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扩张的力度。可以适度降低利率，更重要的是及时调整预算，增加财政赤字，主要是增加中央赤字，大部分用于对中小微企业房租、水电、利息等阶段性补贴，根据企业经营状况，财政补贴可以直接到账；小部分可以转移给地方，缓解地方财政困难，同时要坚决惩处乱收费、乱罚款，营造良好营商环境。适当增加地方财政赤字，主要不是用于新增建设项目，而是弥补现存项目的欠资。

按照国际通行的流量计算方法，可以比较准确评判财政政策扩张或紧缩的力度。应进行科学分析，及时调整预算。疫情产生的疤痕效应是比较严重的，企业、居民和地方政府都在修复资产负债表，信心恢复也需要一个过程。只有资产负债表趋于正常，信心修复，企业才敢投资。只有居民就业情况改善，对未来收入有信心，才敢消费。相应的，财政收入也会增加。

第二，要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为主。相当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增长靠政府投资撬动民间投资。在资本积累到一定阶段之后，效果会逐步减弱。目前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约为54%，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今后这一比重应当在60%以上。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也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贸易伙伴，对全球投资有持续吸引力，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消费市场还有广阔的上升空间。目前大部分农民工在城镇打工，暂住于城镇。让2.9亿左右的农民工真正在城镇落户，会大幅提高消费，也会产生新的就业机会，还有助于提高收入分配公平性。

第三，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高质量发展要求是全方位的，更多地集中于供给侧。要不断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结构性改革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目前影响配置效率最大的是城乡二元结构，劳动力和土地作为最基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不能顺畅流通。只有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农村产业才会有竞争力，也会产生足够的市场需求，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应当是进一步改革的重点方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因此，必须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同时，改革会涉及重大法律修改和相关利益调整，需要逐步探索。这些年来，确实进行了大量的改革探索，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要破除妨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壁垒，促进发展要素、各类服务更多下乡，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第四，着手解决影响财政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首先要区分财政政策短期和长期效应。如果经过科学分析认为短期财政政策需要扩张，就要及时增加财政赤字，使经济尽快恢复到正常状态，这种做法代价是最小的，不会影响财政的可持续性。如果认为某些政策有制度性缺陷，就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弥补缺陷，以免对财政造成长期的压力，损害财政可持续性。

比如说我们的社会保险体系的制度设计不够完善，影响到社会保险基金运营的平衡性。北欧国家在本世纪初曾出现过社会养老体系不可持续的问题，后及时修订制度，每年做出国家精算，向社会公布结果，争取本社会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对退休年龄、缴费标准、给付替代率进行调整，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其中就包括保持财政的长期可持续性，这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财政学会会长、财政部原部长）

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何秀超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前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动能。我们要抓住战略机遇，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力量。

一是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不断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提高发展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我们要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充分发挥外资外资在稳增长和稳就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持续优化国际营商环境，不断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实现互利共赢。

二是要坚持高标准绿色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我们要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完善绿色技术创新支持体系，推动绿色产业快速发展。尤其要推动绿色金融创新发展，积极参与相关国际合作，建立和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促进绿色金融市场的全球性发展。

三是要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当今时代，数字技术已成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我们要用数字经济助力传统经济的转型升级。要充分挖掘数据潜在价值，提升数据供给质量，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规范的数据交易平台，加快数字经济领域立法步伐，保障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推动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高水平财经理论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和高素质财经人才队伍的强力支撑。在优化财经学术研究方面，面对经济领域出现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应着力促进财经领域的学科交叉融合，加快构建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学术研究和自主知识体系；在财经教育发展方面，要广泛运用数字技术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积极推进财经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多样化、全球性、普惠性的高质量财经教育服务；在财经人才培养方面，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创新思维和综合交叉能力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使中国成为全球财经领域人才培养的高地。

（中央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人工智能助力可持续发展

迈克尔·斯宾塞

当前，全球经济发生显著变化。供给侧的弹性和反馈都比过去小得多，主要经济体的生产力正在下降，新兴经济体带来的产能增长不再那么强劲，很多行业（特别是在西方国家）都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再加上气候冲击、疫情冲击以及区域政治局势紧张，这些都导致全球供应链的整合方式发生巨变。

从长远来看，科学技术发展，尤其是目前备受关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可能将开始显现。人工智能的潜力存在于任何能够应用它的经济体中，能够为许多行业带来极大的生产力提升。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可以从大量的数据中获取经验，经过系统处理后向人们提供专业知识和技能服务，而普通劳动者往往要从漫长的实践中才能获得这种专业知识或技能。目前，我们处在人工智能发展的早期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主要作用是辅助人们提高生产效率，它提供的帮助和服务非常便捷，只需要简单对话即可获取，能够适用于许多行业领域。这种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技术，恰好解决了全球经济发展受限，许多地区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抚养比上升和劳动力短缺等问题。

在接下来的三四年里，全球经济形势会相当严峻。我们面临的共同挑战是可持续发展问题，这需要在科学技术领域进行大量投入，从而带动生产力的提高，并推动能源转型。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教授）

善于创造更好的激励机制

罗伯特·奥曼

大部分经济学可以被简洁地概括为一个词：激励。这意味着可以通过研究人们想干什么来影响其行为，使人们愿意且乐于去做事。

母亲给两个孩子分蛋糕，无论怎么切分，总会有孩子感觉自己的太小。但是，如果母亲让哥哥切蛋糕、弟弟分蛋糕，这样的结果是，哥哥为了不让弟弟挑选更大的，会尽量公平地切蛋糕，而弟弟可以优先选择他认为更大的。这就是激励最好的例子。

政府在招标时通常会选择所有投标单位中报价最低的承包商，并且按照他的报价支付费用。然而，经济学家威廉·维克里认为这种传统招标方式会导致政府支付的价格过高，并建议招标时选择报价最低的承包商，但是用次低的报价支付费用。在传统招标方式中，所有投标者要在底价与报价之间压缩利润空间来实现最低报价，而在维克里的建议中，投标者如果中标后仍有高于报价的利润空间，他们会选择更接近底价的报价争取中标，当所有投标者的报价都接近底价时，政府最终需要支付的价格实际更低。维克里认为，这种招标方式创造了更好的激励机制。

企业高管薪酬通常由基本工资和绩效奖励组成，多数企业把股票期权作为奖励，认为这样可以让高管与企业保持利益上一致。但实际上，股票期权不是股票，而是一种获得股票的权利。高管可以根据公司表现或者股价波动选择是否使用这种权利，即便是公司表现不佳或股票价格下跌，只要不使用这种权利就不会有实质性损失。这就意味着公司表现好他们可以获取更多利益，公司表现不佳也没有风险，这种激励方式容易使其做出冒险的决策。如果把奖励换成股票而不是股票期权，那么当股票价格下跌时，高管也会有损失，他们在为公司挣钱的同时也会尽量为公司避免损失。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教授、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加强多边贸易体制，迎接全球贸易新挑战

张向晨

全球生产和贸易在经历了三年疫情的巨大扰乱后，正逐步回归正常。从贸易政策的角度看，过去几年尽管存在一些双边贸易摩擦，但全球范围内未出现大规模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和全球性贸易战。全球贸易呈现出易感性和韧性两方面特征。易感性即发生危机事件时，贸易会很敏感地作出反应，在短时间内遭受冲击。但冲击过后，贸易又能较快地恢复正常，表现出较强的韧性。自由贸易条件下的比较优势依然是商业决策的主要考量因素。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大危机中维持自由贸易，是因为以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制为主体的国际贸易规则一直在默默地发挥着作用，应继续致力于维护和加强这套规则。

全球贸易存在韧性，同时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从而形成新的挑战。一是全球化在放缓，但并没有逆转。目前全球化处于调整期，一些区域和领域在放缓，另外一些区域和领域则在加速。这被称为“再全球化”，具体表现为价值链或供应链在地理上的重新布局。再全球化是对全球失衡的修正，错过上一轮全球化的国家可以有机会参与新的全球价值链，企业家也可以因此实现产业升级和战略调整。二是安全考虑在生产和贸易中的权重在上升。在过去几年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去风险在政府和企业层面都更加被重视，也会反映在企业的供应链布局调整中。安全权重的提升是WTO规则需要面对的一项挑战，如何在WTO规则体系中更加有效地处理安全问题需要系统性地思考。三是数字化正在给生产和贸易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数字技术与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结合，催生出大量的新产品，贸易参与者、贸易对象、交付方式都在发生变化，为未来全球贸易的发展带来新的潜力。数字化也给贸易规则带来巨大挑战，如今数字技术模糊了货物与服务的界限，对规则的适用性产生挑战。同时，数字化也产生了国际规则上的很多空白，比如在数据存储、信息安全、消费者保护等领域目前没有多边规则，这些都可能成为阻碍数字贸易进一步发展的壁垒。另外，数字化趋势的加快更加凸显了数字鸿沟问题。四是气候和环境对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既包括气候和环境对产业本身的影响，也包括环保措施对贸易的影响。

国际社会应对这些挑战，首先，坚持并加强以多边为主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多边贸易体制的主体地位表现出很强的不可替代性。在快速变化的国际新环境下，多边贸易体制的地位应进一步得到加强，以保证国际关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其次，积极推进世贸组织改革，促进多边规则与时俱进。对于安全问题、数字化、环境问题，世贸组织需要尽快制定相关规则，包括对现有规则的修订和对空白领域的填补。第三，加强解决南北失衡问题，特别是数字鸿沟。全球化的调整为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创造了新的机会，国际社会需要一起努力帮助这些国家搭上这趟发展的列车。世贸组织和很多国际开发机构、各国政府正努力通过“促贸援助”提升这些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能力。促贸援助不仅仅是政府和国际开发机构的工作，企业家也必须参与进来，使国际开发更加可持续。

（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

理性认识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

姚洋

我对国际环境的认识相对乐观，主要基于以下方面。

第一，从经贸领域看，世界对中国的依赖度上升，并没有和中国脱钩。2022年，中美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达到近7600亿美元，远高于2017年的5837亿美元。个别国家强推对华“脱钩断链”，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我国依然保持全球最大贸易国地位，出口强劲。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货物贸易出口以人民币计算同比增长8.4%，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加快，对东盟进出口同比增长16.1%。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出口同比增长66.9%，对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出口。2022年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出口国，今年汽车出口还在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外资仍然在进入中国。近三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一直在增长。资本仍然愿意进入中国，并在中国长期投资，是给中国经济投下了肯定票。这得益于中国拥有强大的制造业能力，中国制造业并非大而不强，大就是强，强在我们的综合成本优势以及市场优势上。

第二，关于产业转移，从世界范围看，整个世界的制造业仍在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外流是正常的，这是中国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这也使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生产网络得到强化。产业转移很正常，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产业转移本身也会给我们带来好处，一方面，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做中间产品等，我们的产业链能实现升级。另一方面，我们要以更开放的心态，站在更高的层次上看待别国的发展。中国经济刚刚起飞的时候，有很多国家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也要以开放的心态，欢迎其他国家的发展，这样我们才能多交朋友。

第三，一些发达国家采取“小院高墙”政策，实行技术封锁，将部分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实行出口管制，全面禁止高精度芯片制造设备出口中国。但是，“小院高墙”政策对“实体清单”上的企业，三分之一影响严重，三分之一通过措施规避了影响，三分之一没有实质性影响。反过来，这也促进了我国在芯片领域的发展，促进了进口替代。事实证明，全面遏制、全面脱钩不可能实现。此外，芯片迭代非常快，电子芯片已经快要到达极限，下一代技术可能是光子芯片，我国要加大对光子芯片等未来技术的投资。

理性认识世界形势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如果要说有什么经验的话，开放恐怕是排在第一位的。没有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我们要对世界形势有理性的判断，维持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进步发展仍然是最关键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博雅特聘教授）

提升财政政策效能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马海涛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和工具，财政政策在各主要经济体国家宏观调控工具箱中的主体地位日益凸显。过去十年，我国财政政策不断调整完善，由财政单向发力转为重视政策的协调配合，由逆周期调节转为逆周期和跨周期协同，由强调工具应用升级为与财税体制改革协同发力。

高质量发展对财政政策提出了新要求。一是财政政策要促进创新发展，推动实现创新驱动，提升经济效率。二是财政政策要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补足弱项短板。三是财政政策要坚持生态优先，促进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四是财政政策要助力高水平开放，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五是财政政策要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增进民生福祉。

高质量发展赋予财政政策新使命。第一，财政政策应体现人民性。财政政策应更加立足于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国情，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推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第二，财政政策应体现系统性。财政政策制定和执行应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以下关系：当前民生改善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第三，财政政策应体现全局性。

高质量发展催生财政政策新路径。依托现代财税金融体制，积极拓展政策空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政策协调配合，形成政策合力；构建资金统筹长效机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马海涛）

培育新动能要抓关键因素

江小涓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目标，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等等。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任务十分艰巨。不仅要保持较高经济增速，还要通过提高发展质量带动人民币汇率稳定升值，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推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要多种政策并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

分析来看，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有所好转，但内生动力还不强，需求仍然不足，特别是发展条件发生变化，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需要克服不少困难挑战。比如，近年来，我国劳动报酬明显提高，与发达国家劳动报酬的差距明显缩小，继续靠低成本劳动力大量生产中低档产品并大量出口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我国劳动力数量下降，人口抚养比迅速提高，人口红利带来的增长能量减弱；人民群众诉求多元，资源配置要兼顾各方需求，用于支撑经济增长的资源权重下降；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传统的合作共赢模式改变；等等。

在看到挑战的同时，也要看到机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们积累了新的有利条件，面临新的机遇。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拥有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人力资本具有综合竞争力，参与国际分工程度深，数字经济发展快、规模大。我们要用好这些有利条件，抓住关键因素，以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培育可持续的新动能。在这一过程中，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广泛调动经营主体积极性，坚定推进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在顶层设计方面，要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在进出口方面，要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积极扩大先进技术、重要设备、能源资源等产品进口。在资金流动方面，要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扩大市场准入，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力度；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招投标、标准制定，加大知识产权和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在制度建设方面，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切实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

促进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平衡增长

米歇尔·鲁塔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目标之一是促进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平衡发展。当前，在多重冲击、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和削弱的多边贸易体系背景下，贸易效率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将开放贸易与支持性的国内政策相结合，对于经济稳定和增长以及解决贫困减少、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和气候变化等挑战仍然至关重要。有必要进一步加强IMF在贸易领域的工作，以帮助各国政府应对这些挑战。

尽管人们对去全球化进行了大量讨论，但贸易数据显示出更加复杂的情况。全球贸易增长已经放缓，但其表现并不一致。货物贸易增长的放缓早于全球金融危机，主要是由结构性因素导致的。全球价值链扩张的减速和贸易成本的放缓是导致货物贸易增长持续下降的主要推动因素。然而，服务贸易由数字化等技术创新推动，表现出更大的活力。

贸易政策形势在恶化。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正在上升。针对贸易紧张局势、疫情和乌克兰冲突，贸易限制措施和其他扭曲性政策不断增加。在贸易政策的其他领域，非关税措施和补贴也在激增。

与此同时，改革进展缓慢削弱了多边贸易体系。传统问题如农业补贴和关税仍未解决，而新问题如监管分歧和投资限制则不断出现。国内贸易措施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使谈判议程更加复杂。加强规则建设、增强透明度、进一步开放市场并恢复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有效争端解决机制至关重要。

在未来几年，各国政府将面临三个重大的新贸易挑战。首先，技术和气候变化等结构性因素预计将重塑全球贸易。其次，贸易与非贸易领域日益相互联系，贸易措施经常被用于实现粮食或国家安全等非贸易目标。第三，频繁使用贸易措施和产业政策正在增加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削弱多边贸易体系的稳定性。

在这种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更新其贸易战略。这涉及将宏观经济、金融和财政方面的核心能力引入贸易领域。更新后的战略旨在加强IMF的多边和双边监测，并与世界贸易组织等其他国际组织进行合作，主要目标有三个。首先，旨在帮助各国政府应对技术变革带来的贸易机遇和风险。其次，将促进贸易与非贸易目标之间的政策一致性。最后，旨在加强多边贸易体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战略与政策审查部副处长）

2023 全球财经论坛 Global Forum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高质量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高培勇

高质量发展是相对于高速增长而提出的一个概念，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其间所发生的最基本最重要也是最突出最深刻的变化在于发展理念变了。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一定要以新发展理念作为引领。从这个意义上讲，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工作的试金石和评估标准就是看是否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是否契合新发展理念的要求。

面对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任务，面对当前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的现实，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立足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理念为指挥棒、红绿灯，确定当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要特别指出的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实际上是对应经济运行中的短板弱项来展开的，是对应经济工作中的重要着力点来展开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个方面具有明确的针对性。

当前最受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宏观政策该怎么布局。

一方面，当前谋划宏观政策布局时必须注意不能再次落入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2013 年，党中央作出判断，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其中，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中“消化”二字指出了任何的刺激政策在带来一系列积极效应的同时不可避免会产生一定的成本。因此，当我们准备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时，要特别注意对扩张力度的把握、扩张规模的掌控。

另一方面，要把握好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在今天的中国，安全发展贯穿于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宏观政策布局除了要把握好发展这一维度外，还要把握好另外一个维度，即安全。党中央提出要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其中增加了“安全”到原来的基础之上，并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足以凸显安全的重要性。在宏观政策布局上，我们要注意防风险，确保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

具体而言，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工作。

一是做成本效益分析。任何刺激政策、扩张政策既有成本又有效益，在宏观政策布局时既要想方设法地增效益，又要想方设法地降成本。无论是全局还是局部，我们所追求的目标要满足政策效益大于政策成本，只有得大于失才能干。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守住财政金融安全的底线，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来换取政策目标的实现。

二是对症下药。要了解清楚扩张性政策能够解决什么问题、不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在解决哪些问题上特别有效。当前经济运行当中所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可能不仅是周期性的，可能还有体制性的、结构性的，必须整体考虑和谋划。同时，也要知道解决多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并非逆周期调节或者扩张性政策这一味药可以医治，多年的研究和实践告诉我们，解决问题既要靠政策安排又要靠制度变革。特别是当前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宏观政策不可能包打天下。例如，针对预期转弱这样的压力，扩张政策独木难支，因为扩张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针对短期影响。预期转弱必须依靠改革，必须靠营商环境的改善，只有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宏观政策配置不能病急乱投医，要防止在政策轨道上出现拥挤现象，要坚持对症下药，精准施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

为实体经济提供优质金融服务

刘　成

当前，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有条件有能力实现健康持续发展。商业银行要坚定信心，围绕高质量发展要求，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更加注重稳健经营，努力满足企业和居民多样化金融需求。

一是金融服务要“提质”。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主要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发力，关键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把握住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浪潮，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升级，但传统金融业务逻辑、服务产品、机构体系难以与之适应。商业银行和

各类金融机构必须加快自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适配科技创新、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经济数字化发展的需要。

二是金融服务要“扩面”。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必须广泛调动全社会积极性能动性，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大限度地提升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可获得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和各种金融机构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薄弱环节，加强对三农、小微、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支持，既重视支持生产领域又重视扩大消费，既重视全面服务企业又重视全面服务居民个人。

三是金融服务要“增效”。高质量发展需要以更高效的金融服务满足经济发展需要，以同等的货币供应量、社会融资规模推动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为此，商业银行和各种金融机构要坚持市场导向配置资源，加大精准支持，强化综合服务，通过金融服务效率的提升，优化储蓄向投资转化机制，提高全社会资本效率。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商业银行要拓展服务内容与范围，从传统商业银行服务向综合融资转变，从服务成熟客户向服务“更早、更小、更新”客户转变；加强顶层设计，围绕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乡村振兴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构建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的服务体系；将最新金融科技技术，引入服务体系中，帮助企业提升资金智能化运营效率，助力实体经济智能化升级；打造开放融合的金融服务生态，聚合资金、资产、渠道、产品和服务，最大限度为企业提供一体化、一站式的综合金融服务。

（中信银行拟任行长）

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值得关注

乔治·佩罗歇

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在增加，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一些地区不能达到发达地区的水平。在欧盟内部就有发达的经济体和不发达的经济体及地区，因此我们出台了一些政策，获得了欧盟委员会的资金支持，用于最薄弱的地区。

关于地区不平衡现象的研究和理论，有两种学派。一种学派认为，受资本生产率缩减等均衡机制的作用，最终贫穷的地区和富裕的地区会趋同；另一种学派的观点则完全不同，认为增长具有选择性和积累效应，贫穷的地区很难自己获得增长，除非获得外部的支持。

在整个欧洲经济空间中，有一些国家和区域的表现远远超过某一个国家或整个区域的平均水平，享有极高的富裕水平。

导致这种不平衡的因素有很多，特别是一些新的驱动因素值得关注。第一个因素与经济的数字化有关。信息通信技术往往是颠覆性的技术，对数字技术和高等教育进行了极大投资的地区实现了快速增长。第二个因素是人口结构的变化。老龄化、人口迁徙等变化在很多欠发达区域直接影响到其公共服务和养老金的体系，造成了人力的外流。第三个因素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对工作供给、薪酬设计的影响，也会成为人口迁移的驱动因素。欧盟各国开放了边境，可以进一步促进人员的流动，人们更方便从一国移动到另一国。在欧盟内部没有资本、产品和劳动力移动及迁徙的限制。欧盟整合的过程让那些更发达的经济体受益，因为其处在更具优势的位置上，可以更好地利用自由贸易和自由流动所带来的机会；而那些较为薄弱的地区，则面临着对收入水平及劳动力市场的一些负面影响。

总之，欧盟不同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存在的，而且并不会轻易消失。还

有其他一些驱动因素，也依然持续地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影响着不同区域发展的未来。人力和资本都更愿意流向那些经济发达的区域。所以，在欧盟，尽管实施了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政策，但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市场的动能要比政策应对发挥的作用更强，这是要特别注意的。同时，区域政策需要审视政策实施层面及资源的配置。

（希腊色萨利大学教授、前校长）

中国面临更多机遇与挑战

傅晓岚

中国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速接近 9%。国际贸易迅速发展，成为最大的出口国。同时，有 8 亿多人摆脱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尽管面对从新冠疫情中复苏、推进行政体制改革、降碳减排、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重构、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等一系列内部和外部挑战，中国的进出口规模依然不断扩大，对外投资和资本流入不断增加，对全球贸易和投资产生着重要影响。

在经济发展、脱贫攻坚、创新驱动和全球合作等方面，中国正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朝着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不断迈进，为人类福祉做出了更大贡献。中国设定了 2023 年的 GDP 增长目标为 5%，体现了其经济韧性和政府自我调节能力。在研发领域投入大量资金，研发总投入高于欧盟所有成员国的总和，仅次于美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已成为全球第一。通过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把握绿色化和数字化的发展机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中国呼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同世界各国加强合作，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稳步发展。

（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发展中心创始主任，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提高金融服务绿色发展和科技创新效能

绿色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也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在首届全球财经论坛上，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如何实现金融服务绿色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有效性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表示，提高我国城镇化率和健全碳交易市场可以被视为达成“双碳”目标的主要路径。一方面，城镇化建设一定会带来碳的集中排放。从国际经验看，达到一定城镇化率（即达到边际公共服务需求）的国家更容易实现“双碳”目标。2022 年，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普遍处于 80%—85% 的区间内，日本的城镇化率超过 90%。以此为参考，我国城镇化率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的碳交易市场仍处于初级建设阶段，换手率仅有 4%，市场流动性和资产价格发现效能明显不足。周诚君建议参考其他金融市场的成熟经验，制定碳交易市场规则，提高市场交易活力，完善碳资产定价机制。比如，允许控排企业以外的市场主体参与碳交易，提高全社会的控排意识；提高碳资产交易中介机构服务的专业门槛，支持中介机构参与碳交易。

银行如何支持绿色产业发展？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助理刘莉亚表示，当前我国绿色产业迅速发展，传统融资手段难以满足产业发展需求。虽然我国很早就引入了零碳金融的概念以支持绿色产业发展，但是在差异化绿色资产风险权重方面仍需进一步进行探索。因此，她建议，在我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持续开展降低绿色资产风险权重的区域试验，推动制定绿色 / 棕色资产风险权重赋值全球统一标准。在设计差异化绿色 / 棕色资产风险权重计量方法时，兼顾长期零碳转型与短期经济稳定，谨慎设置不同资产的风险权重。需考虑当棕色资产的风险权重比绿色资产高出太多时，“两高”行业受到负面冲击可能导致投资和就业下降过多，由此产生长期零碳转型与短期经济稳定的矛盾的情况。此外，还要评估行业所处产业链位置的价值。如果某行业处于绿色行业上游，为降低绿色产业发展成本，可考虑在绿色产业发展初期不提高甚至适当降低该行业的相关信贷风险权重，待绿色产能稳定后，再恢复或者提高该产业风险权重。

以金融支持推动创新突破带动产业发展，也是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的题中应有之义。创新驱动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定义性特征，高质量发展就是创新作为第一动力的发展，只有创新驱动才能推动我国经济从外延式扩张上升为内涵式发展。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胡海峰表示，新兴产业企业具有的发展速度快、股权结构复杂、盈利不确定等特点，与银行传统风控文化不相匹配，导致企业难以获得银行信贷青睐，常常面临融资困难的问题。因此，要改变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市场结构，大幅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通过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加快创新资本形成，促进科技、资本和产业的紧密融合。同时，他指出，优化我国金融融资结构的主要路径是深化资本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提高资本市场透明度、建立长期资本入市的制度、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建立风险预警和处理的防控机制。

（转自《中国财经报》2023 年 7 月 11 日）

出版：中央财经大学校报编辑部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39 号　邮编：100081　电话：(010)62288218　网站：http://xiaobao.cufe.edu.cn　投稿邮箱：xbbjb@cufe.edu.cn